

现代中国历史走向

迷茫与抉择



金万成 毛军 著



東北大學出版社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现代中国历史走向

迷茫与抉择

金万成 毛 军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 阳 ·

© 金万成 毛军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茫与抉择/金万成, 毛军著.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517-0529-5

I. ①迷… II. ①金… ②毛…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研究
IV. ①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4899 号

出 版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3 号巷 11 号

邮编: 110819

电话: 024—83680267 (社务室) 83687331 (市场部)

传真: 024—83680265 (办公室) 83680178 (出版部)

网址: <http://www.neupress.com>

E-mail: neuph@neupress.com

印 刷 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发 行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3.75

字 数: 342 千字

出版时间: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汪彤彤

责任校对: 春 晓

封面设计: 王宇彤

责任出版: 唐敏志

ISBN 978-7-5517-0529-5

定 价: 3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铁幕”下的北京/1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有着缕不清理还乱的“恩恩怨怨”。毛泽东曾在小范围内讲，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总体上是“两头好，中间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冷战对峙升级，留给新中国外交的空间非常狭窄。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

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成为各路记者闪光灯的聚焦点，中国外交开始了“合纵连横”的新选择。

有核心未必是好事，没有核心可能就要坏事。对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全盘否定的“秘密报告”，毛泽东“不埋单”。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坐上了“过山车”，中苏关系经历了十年友好、十年论战、十年对抗。

“铁幕”徐徐落下/2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际，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聚首黑海之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三巨头”表面上谈笑风生，却掩饰不了各怀心事。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苏、美、英三国最终签署了《雅尔塔协定》。然而，《雅尔塔协定》中涉及的“重要利益方”——中国，却对《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一无所知、毫不知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宣告了美、苏“蜜月期”的结束。在美国的一个小镇——富尔顿，来访的丘吉尔发表了“震惊西方世界”的“铁幕演说”。

美国驻苏联办事处发往华盛顿的“超长电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

上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一次次地提升“反苏”“反共”的调门。美国的“遏制政策”令斯大林愤怒不已。苏联决定：针锋相对，以牙还牙。

“铁幕”徐徐落下，苏、美两大集团对峙升级，“冷战”格局令新中国的外交舞台可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

无可奈何的一边倒/8

从理论上讲，新中国外交有三种路径可供选择：一是同苏联结盟，联苏抗美；二是同美国友好，与苏联疏远；三是不偏不倚，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然而，冷战格局的形成，令中国外交的选择由“多项选择”变为“单项选择”。

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非中国共产党“喜欢”或“愿意”，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派使者秘密造访中国共产党，劝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划江而治”，以免引起“美国出兵干涉”。毛泽东发出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谈及渡江战役之事时，谦逊地说：“当年，我们没有听从您的劝告。”斯大林也婉转地回应道：“胜利者，是从来都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定海神针”。苏联方面提出建立“联合电台”“联合舰队”的建议，一次又一次地令中国共产党高层嗅到来自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

“不是来吵架的”/14

1954年，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五国，倡议召开“亚非会议”。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新中国外交摆脱一边倒，实行“走出去”战略的“难得机遇”。

中国方面迅速做出反应，邀请缅甸、印度尼西亚领导人来华访问。毛泽东在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期间，释放了中国希望参加“亚非会议”的强烈信号。

台湾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妄图阻止中国代表团的“万隆之行”。身穿灰布中山装，神采奕奕的周恩来，成为“万隆会议”上各路记者闪光灯的聚焦点。

中国总理的“万隆演讲”，令世界为之倾倒。美国记者感叹道：“亚非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共产党的中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万隆会议”掀开了新中国外交“合纵连横”的新一页。亚非各国纷纷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外交大国战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冉冉升起。

“秘密报告”引发震荡/26

有核心未必是好事，没有核心可能就要坏事。斯大林逝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定海神针”，令世界为之震惊。

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逝世后，斯大林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铁杆反共分子”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片骚动”。1956年波兰波兹南工人爆发大规模罢工事件，1957年30万匈牙利民众走上布达佩斯街头游行，纷纷提出摆脱“斯大林模式”。

对赫鲁晓夫做的“秘密报告”，毛泽东“不埋单”。毛泽东撰写《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以苏联为戒”，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由“论战”走向“对抗”/34

历史上，沙皇俄国曾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深印记。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高举“反对个人主义”的大旗，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共中央提出，以“苏联为戒鉴”，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二次“台海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引起中国共产党的强烈不满，并由此浮想联翩。

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九篇驳斥苏联的文章。中苏关系由最初的“盟友”走向“论战”，最后发展到“对抗”。

第二章 远东的“巴尔干”/47

中世纪以来，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多次成为战争的发源地，素有“欧洲火药库”之称。近代以来，亚洲的朝鲜半岛因日、美等国的侵略，诸多矛盾在此聚焦，成为远东的“巴尔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因苏、美两大集团的利益划分，以北纬38°为界，被人为地分割成北朝鲜、南朝鲜两个部分。

美军越过“三八线”，悍然发动对朝鲜的战争，战火烧至中朝边界的鸭绿江畔。“唇亡齿寒”，“参战有损失，不参战损失更大”。在艰难中，中共中央作出抉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唱着嘹亮的军歌，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开始了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来到三八线边境的小镇——开城，走进板门店的谈判小屋，美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的错误的战争”。

北纬38°/48

北纬38°，这是一条“神奇”的纬线。

它，穿越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

它，穿越了世界上最深的海洋——马里亚纳海沟；

它，穿越了密西西比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长江等众多大江大河的入海口。

当然，北纬38°之所以著名，更因为它是朝鲜和韩国之间一条“人为”的军事分界线。

“不出兵损失更大” /52

朝鲜局势危急，金日成向斯大林、毛泽东分别发出“请求出兵”的信函。

斯大林回复金日成，认为对朝鲜最适合的军事援助是组建并派出一支国际“志愿部队”。斯大林认为，这支“国际部队”将主要由中国军队组成。因此，关于出兵朝鲜问题，需要同中国商量。斯大林把“皮球”踢到了中国方面。

美国提防苏联和中国，小心翼翼地避免进一步刺激苏联和中国。美国政府在给麦克阿瑟的指令中明确表示，只有在苏联和中国都不会参战的情况下，才可“进一步”攻击朝鲜。美国政府方面要求麦克阿瑟必须清楚，朝鲜战争只是一场“有限的战争”。麦克阿瑟也信誓旦旦地向美国政府表示，中国“绝不可能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事”。

中共中央反复研究出兵朝鲜的利弊，最后毛泽东拍板定案：出兵损失很大，不出兵损失更大。

中国入朝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与“联合国军”作战/57

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中共中央估计了“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在朝鲜境内歼灭或驱逐美军，完全解决朝鲜问题；第二，压迫美军撤退至三八线以南，迫使美国同朝、中方面举行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第三，打成僵局，并且美国对中国公开宣战，美国空军轰炸我国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美国海军进攻我国沿海地带。

毛泽东的态度是：努力争取第一种可能，准备接受第二种可能，力争避免第三种可能。

打着“白旗”来谈判/61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全世界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个叫“板门店”的小山村。

为了表明坚定的“反共”立场，美国人宁愿扛着“白旗”，也不愿打着“红旗”来谈判。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宣告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颜面扫地”，宣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美国人不得不慨叹，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的错误战争”。

第三章 批判的端倪/67

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如何进一步宣传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旋律，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重要课题。

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就撰写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顿”活动。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风的“文艺思想”等，纷纷成为批判的对象。

文化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批判活动中，显露出“政治替代学术”“政治压制学术”的端倪，为后来“反右运动”的开展埋下了“伏笔”。

“乞丐”成“批判对象”/67

清朝末期，武训“行乞兴学”，对此后人褒奖有嘉。

著名导演孙瑜将武训的生平拍成了电影《武训传》，令人意料之外的是，由此武训竟成为新中国文化领域一系列大批判狂澜的“首当其冲者”。

“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的武训，转眼间变成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

随着对《武训传》后批判在全国展开，周恩来、朱德、郭沫若、夏衍等一大批中央领导、文化艺术名人纷纷检讨。武训风波，也给江青提供了“插足”文艺界的“天佑良机”。

“耀眼”的“两个小人物”/75

两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撰文，与“红学泰斗”俞平伯展开“学术争鸣”。

毛泽东酷爱古典文学，对《红楼梦》有独特的看法。毛泽东非常欣赏“两个小人物”的敢想、敢做、敢为的作风，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文艺报》对“两个小人物”的“漠视”，令毛泽东感到“气愤”。同时，也令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瞬间，一场学术争鸣转化为“政治性的批判”。

20多年后，当时的主角俞平伯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淡淡地说了一句：“那次运动不是没道理的，但是过了头。”

“两个口号”之争的嬗变/8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下，反对国民党统治、不满文化专制的文化界人士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周扬、夏衍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与此相对，鲁迅、胡风则提出了“大众文学”的口号。“两个口号”之争，在左联内部产生了强烈的震荡，甚至引发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发生在上海的这场“两个口号”之争也非常关注。他曾讲，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我们要原谅他，尊敬他。

“两个口号”之争并没有因毛泽东的“盖棺定论”而“销声匿迹”，依然是“暗流涌动”。

胡风所以屡屡成为斗争批判的对象，最终发展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方面是因为胡风个人的秉性“顽固不化”“不见棺材不掉泪”，甚至“见了棺材也不掉泪”；另一方面又与新中国需要建立文化“新秩序”及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密不可分。

胡风事件中，私人信件被当作“呈堂证供”，令人感慨万千。

胡风案件的平反一波三折。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胡风案件的“错综复杂”。

第四章 轰然倒下的“东北王” /92

高岗、饶漱石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发生的首次党内高层“路线斗争”。

在党内斗争中，在正式会议上讲曾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生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还是“独一份儿”。

高岗在《我的反省》中，承认“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但对中央的“处理结论”，拒不接受。

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东交民巷8号自己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的消息后，沉默良久，说：“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说，高岗是自绝于党，咎由自取。毛泽东沉思片刻，对叶子龙说：“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

毛泽东还对叶子龙说：“本想让高岗还当个省委副书记，去陕北，保留党籍、中央委员。让高岗回延安工作，高岗也会愿意的。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从“西北王”到“东北王” /93

陕北根据地，历史性地肩负起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过程中重要的“两个点”——中国共产党进行战略大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开展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谢子长、刘志丹先后牺牲，“代表人”的角色自然落到了陕甘边根据地另一位领导人——高岗——的肩上。

东北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地区，高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俨然是个“东北王”。

从西北到东北，高岗一路顺风顺水，得意扬扬，踌躇满志。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97

1952年8月，为了适应国家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党中央做出重大的人事调整，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

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东北局书记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新中国在中央机构的设置上，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做法进行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权力高度集中，素有“经济内阁”之称，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高岗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新上任各中央局书记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取代刘少奇” /101

1953年，毛泽东提出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并主动提出自己要退居“二线”。

高岗认为，毛泽东退居“二线”，自己的机会来了，加紧对刘少奇的攻击，并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达到“公开”的程度。

针对高岗、饶漱石散布的“圈圈”“宗派”问题，毛泽东说：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这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毛泽东的讲话并没有令高岗警醒，高岗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诽谤刘少奇的活动。

中央决定开展对高岗、饶漱石的批判。高岗请求当面向毛泽东进行“解释”，遭到拒绝。

在批判会议进行时，高岗在自己的住处企图触电自杀，未遂。

高岗在撰写的《我的反省》中，承认“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但对中央对自己所下的“九条”结论“拒不接受”。

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东交民巷8号自己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饶漱石在检讨中，只承认“自己只是客观上与高岗的反刘少奇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饶漱石辩称，并不存在什么“高岗在幕后，我为先锋”的事情。

第五章 “扩大化”的反右/111

为繁荣文化艺术，避免重蹈“苏联覆辙”，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毛泽东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经过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主题。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实际上，为知识分子“脱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戴上”了“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桂冠”。

似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即将结束，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景象应当是：在盎然的“春天”里，“百花齐放”，争相斗艳。然而，“事情正在发展变化”。

“抉择”在“迷茫”中，再次“断裂”。

短暂的“春天”/112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无论是文化艺术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政治压制学术”“政治替代学术”的现象非常普遍。

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毛泽

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切，使新中国迎来了科学、文化发展的春天。

反右运动的开展，令人们在盎然的“春天”里，感受到一股股寒意。

“事情正在起变化” /115

波兰、匈牙利事件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冲击。一方面，中共中央吸取了波匈事件的教训，决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另一方面，波匈事件也令中共中央保持“高度警觉”。

当整风运动中出现了极少数人向党发起进攻时，毛泽东对事情的判断发生了偏向。

不是“阴谋”是“阳谋” /119

整风运动中，极少数人发表反对共产党的言行，令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发生了偏差。毛泽东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反右运动”定了“基调”。

阴谋也罢，阳谋也罢，都不过是一种手段、方法而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手段和方法，而在于手段、方法的施用对象。当将解决敌我矛盾的手段、方法用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错误和悲剧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错在“扩大化” /126

“反右运动”期间，全国共揪出右派分子 552877 人。

1980 年，全国开展了“错划右派”的平反工作。绝大部分右派或被宣告错划或给予平反，全国只有不足百余名右派分子仍“维持原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第六章 “跃进” 狂飙 /131

中共中央领导层“冒进”与“反冒进”之争，是两种不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博弈。

各地纷纷“放卫星”。亩产粮食百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为了实现三年“超英赶美”的美好愿景，不仅仅是工人、学生，就连

种庄稼的农民，也放下了手中的镰刀，站到了“小高炉”旁。

“共产主义是乐园”，大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徐水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响亮的口号令人目眩。

1961年1月13日，河南信阳地区最后一次呈报中央的确切数字是：全区总人口8086526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人，占总人口的13.2%。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迅即蔓延的“大饥荒”，将沉浸在“虚幻”中的“梦中人”惊醒。

“冒进”与“反冒进”/132

围绕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中共中央领导层发生了“冒进”与“反冒进”之争。

在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这样提”。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纷纷作了检讨。

“冒进”与“反冒进”之争，是两种不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博弈。“冒进”，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势规定了“大跃进”的基调。

“放卫星”竞赛/137

“大跃进”运动中，人们将上报“高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的行为统称为“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口号喧嚣，各地“浮夸风”盛行，纷纷虚报、夸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什么“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各种“卫星”满天飞。

同农业战线一样，其他行业也纷纷“放卫星”。教育战线表示：要“一县出一个郭沫若、梅兰芳”“一村出一个鲁迅”“一村出一个李白”。

三年“超英赶美”/148

毛泽东很早就有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心愿。由于受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要在十五年“赶超美国”口号的影响，毛泽东轻率地提出了中国也要在十五年“超英赶美”。

“赶超”的时间一再缩短，由最初的十五年缩短为七年，再缩短为三年。

为了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全国各地纷纷建起了小高炉，一场全民

参与的“大炼钢铁运动”拉开了序幕。

“大饥荒”蔓延/153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把1959—1961年出现的“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

从目前已知的原始天气数据表明，1959—1961年这三年间，全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严峻的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四川省，原始气象数据表明，这三年的天气与常年无异。

“大饥荒”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约1500万人。有学者指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3000万人。还有学者指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4400万人。

第七章 庐山迷雾/164

“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严重问题。

毛泽东始终坚定地认为，“三面红旗”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问题”。

彭德怀的“万言书”中“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等字眼，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三面红旗”是神圣的，是不容否认的。

遥想当年，毛泽东曾赞誉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然而，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定性”地讲，在历史上彭德怀和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倒的真正原因，就像庐山的迷雾，让人看不懂，看不清。这不禁让人想起宋代大诗人苏轼对庐山的描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截然不同的“还乡”/165

历史总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巧合构成。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彭德怀回乡后，看到的是“浮夸风”“共产风”“大炼钢铁运动”给家乡百姓带来的“痛苦”，甚至是“灾难”。彭德怀心情沉重，心中积蓄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

鼓咙呼”的心境，踏上了庐山……

毛泽东回乡后，虽然也看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总的心情是轻松的、愉快的。毛泽东吟诵着“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踏上了庐山……

“神仙会”上的“万言书”/169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庐山会议要开成一个轻轻松松的“神仙会”。没有想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将“神仙会”变成了“批斗会”。

彭德怀的“万言书”中“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等字眼，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三面红旗”是神圣的，是不容否认的。

性情坚毅的毛泽东与性格刚强的彭德怀“碰撞”，结果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分……

“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174

庐山会议期间，有两封针对“三面红旗”的信，曾“轰动一时”。一封是彭德怀的，另一封是李云仲的。然而，这两封信的命运，却各不相同。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彭德怀在三十一年来，在各次错误路线中都犯了错误。彭德怀与他的关系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对于李云仲的来信，毛泽东做了不同于彭德怀信的另一番评价。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林彪讲，彭德怀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个人欲望，个人要求，他是想来当个大英雄”。“毛主席是个真正的大英雄，他也觉得他是个大英雄，两雄不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

庐山会议最终认定，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结成“反党集团”，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有目的地活动，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

庐山风云/188

接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后，毛泽东陷入了沉思。31年来，毛泽东与彭德怀并肩战斗，从井冈山到江西瑞金，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延安，从百团大战到西北战略大转移，从新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庐山风云犹如庐山迷雾，隐隐约约，让人们永远无法看清、看透。

第八章 “调整”中的再次“迷失”/194

七千人大会后，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然而，毛泽东对刘少奇所采取的“调整”方案“不满意”。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开始出现重提阶级斗争的苗头，其中小说《刘志丹》事件、关于包产到户的党内争论，加速了前进道路抉择中的进一步“迷失”。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而是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

“四清运动”中刘少奇的“尴尬处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调整政策的终结，再次陷入抉择的“迷失”中。

陈云的“长篇发言”/194

陈云是中央副主席，在党内排名第五位。论经济工作，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是党内公认的“理财能手”，是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大总管”。

在七千人大会上，几乎所有的中央高层领导都发了言，陈云是唯一没有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希望陈云讲一讲，曾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毛泽东的邀请。

七千人大会后，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刘少奇认为七千人大会对错误总结得“不够透彻”，于是主持召开西楼会议，继续讨论遇到的“经济困难”。

西楼会议的基本思路是：改变“大跃进”运动时期在经济工作中执行的计划和方针，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做了主旨的“长篇发言”。

毛泽东得知陈云的“长篇发言”后，对陈云的做法“很是不满”。西楼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也成为陈云政治生涯的一个“拐点”。

政治风向的逆转/199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偶然之中包含着必然，必然又是通过偶然一步步地展示。

小说《刘志丹》事件和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这两件看似偶然的